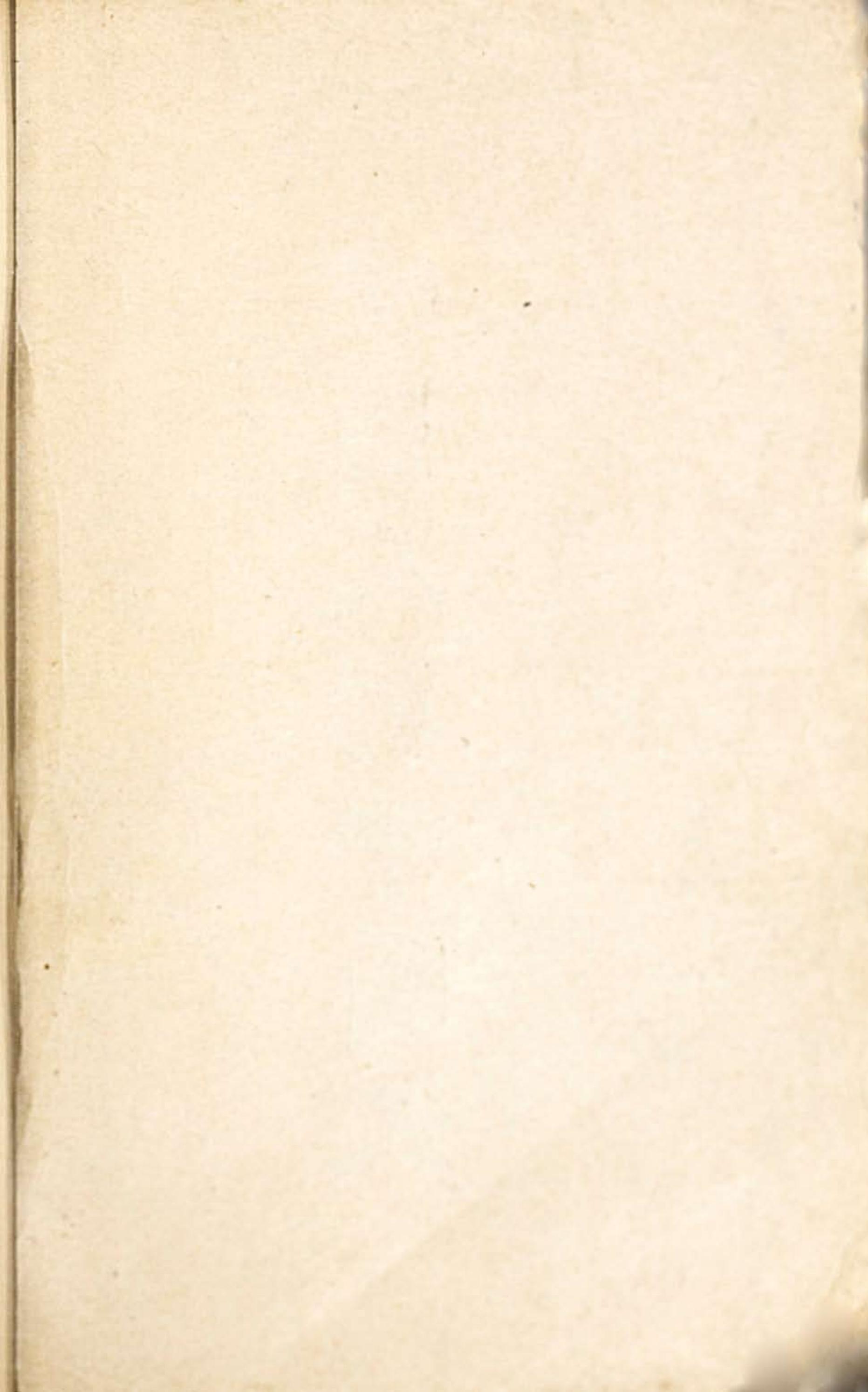


中國人與中國文



中國人與中國文

羅常培著

開明書店印行

# 中國人與中國文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每冊定價一元一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著作者

羅常培

有著作權\*不準翻印

# 目錄

中國人與中國文	一
中國文學的新陳代謝	九
師範學院國文學系所應注意的幾件事	三
我的中學國文教學經驗	三三
從文藝晚會說起	五〇
誤讀字的分析	五七
國語運動的新方向	七七
中國語裏的借字	八五
從崑曲到皮黃	九三

附錄

老舍在雲南 ······ 一〇七

我與老舍 ······ 一六

曇花未現 ······ 二三

## 自序

從來不愛寫通俗文章，也不善寫通俗文章。關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七年，連教科書一類的著作都被別人擰擣搶先了，哪裏還有閒空兒寫這一類的小玩藝兒？所以已往的十幾年羅莘田的名字很少在報章雜誌上出現過。

避地南來以後，因為圖書設備的缺乏，舊來已開始或將着手的研究工作都鑽進行。再加上中年以往的人社會上常常有意無意地逼迫着他驚外，如果一時因為情面難却替某種刊物寫過一篇雜文，以後就很不好意思對其他刊物嚴詞拒絕，擰筆不寫。這十二篇東西和另外一本叫做「讐言」的小冊子就是這樣硬擠出來的。

把它們結集起來重看一遍，也倒覺得這番功夫並不完全白費的。做學問固然要求精深，同時也不要忘記普及。倘使一貫地老抱着「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

君」的態度，那豈不失掉教育的意義了嗎？這幾篇小文雖然談不到深入，却自信一  
尙能淺出。從第一篇到第五篇是爲教國文或學國文的人們說的；第六七八三篇是  
關於語言文字的常識和我對於國語運動的新看法；第九篇是關於近代戲劇史的通  
俗講演。附錄三篇的性質和本集相距較遠，但因一時無所附麗，暫時也把它們編  
在後面。

不久，我也許到太平洋彼岸的一個大學去教書，在最近一兩年內恐怕沒有機  
會再作這一類的文字，因此才想把它們結集起來，一方面防備它們散失，一方  
面也給自己的生活留下一段片影。

讓我在這兒謝謝葉聖陶朱佩弦兩兄，因爲他倆對於這本小冊子的出版都予以  
不少的助力。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羅莘田識於點蒼山麓。

# 中國人與中國文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昆明廣播電台講演——

語言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結晶，這個民族過去的文化靠着它來流傳，未來的文化也仗着它來推進。凡屬一國的國民對於他本國固有的語言文字必須有最低限度的修養，否則就不配作這一國的國民。

中國有將近五千年的歷史，開化很早，文化很高，從有史以來就有文字的記載。這種文字屬於衍形系統，在世界各國除去埃及和蘇墨利亞的古文很少和它相關的。它的形體比較繁難，含義比較複雜，從這方塊字的本身又得不到什麼發音的符號，所以很不容易認識。回想我們從小時候開蒙讀書以來在識字一方面真不

知花去了多少冤枉工夫，從教育的觀點來講，這是很不經濟的。最近幾十年有些人很熱心的提倡漢字改革運動，由這種運動的結果便產生了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三種輔助漢字或代替漢字的東西。關於這方面的批評，容我另外再講，現在先就漢字本身來討論中國人對於中國文應該具有的最低程度。

對於中國文的修養，第一步先得識字，這本來用不着多費話的。可是認真講起來識字就不是一件容易事。能夠認識現行的方塊漢字已經很麻煩了，若是追溯它得形的來源，似乎還得知道從刻在烏龜殼兒和牛胛骨上的甲骨文，以及鐘鼎彝器上的金文，再經過大篆，小篆，隸書，楷書幾次演變，才成了現在的樣子。若是分析它的結構，似乎還得認清擬象物形近乎圖畫的「日」「月」，視而可識察而見意的「上」「下」，會集兩文比類合誼的「武」「信」，半形半聲音義兼顧的「江」「河」等等，知道他們在組織上是不同的。再從意義來講，例如：「東」「西」「南」「北」四個字，「東」本來當「動」講，從「日在木中」得義，

後來轉變爲東方；「西」象鳥在巢上之形，日在西方而鳥西（棲），因以爲東西之西。商「任也」，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水羊聲。（段玉裁注，漢書律曆志曰：「大陽者南方，南，任也。陽彙任養物於時爲夏。」云草木至南方者，猶云草木至夏，有枝任者謂夏時草木暢懋丁壯，有所枝格任載也。故从水。）「北」當乖戾講，从二人相背。本來是古「背」字，引伸爲北方。尙書傳，白虎通，漢書律曆志皆言北方伏方也，陽彙在下，萬物伏藏，亦乖之義也。……固然，每個字的意義沒有能離開上下文而存在的，從應用的眼光看，只要知道那個字「約定俗成」的用法怎樣也就夠了。可是要想推究那個字得義的原由，那就非得稍有字源學上的常識不可。至於漢字的讀音更較困難了。因爲方塊字的本身表現不出什麼音素來，不能看見字形便念出聲音。諧聲字的偏旁最初本是當聲符用的。後來聲音遞變的結果，它不單不能代表聲音反倒會耽誤事。例如「剛愎自用」不念「剛復自用」，「茜紗窗外」不念「西紗窗外」，「始作俑者」不念「始作誦者」，

「獅子吼」不念「獅子孔」。還有因爲形近而念別字的也不勝列舉，例如把「楞  
臆從公」唸成「楞腹從公」，把「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斡旋」念成  
「幹旋」，「匕首」念成「叱首」，都是一時傳作笑話的。（參看我所作的「誤  
讀字之分析」）。我講這一段話的意思並不是希望人人都成了文字學家，我只希  
望一般人對於漢字的形音義稍微有點兒常識也許對於認字上減少一些困難。如果  
教給小孩子認字的時候，能夠把形音義三方面都用極淺顯的話剖析透澈了，我想  
總比讓他囫圇吞棗的效果大的多。

爲什麼要識字呢？當然希望一般人對於現在和以前用這種文字所寫的書能夠  
看得懂。篇章是由字句積累而成的，假如不識字，儘管有多麼好的文章，多麼有  
用的書，如何能得到益處？要想了解今人或古人所寫的東西，第一先得把逐字逐  
句的意義弄清楚了，不單每個字的意義絲毫不能含混，尤其是這個字在這句話的  
上下文裏的實際的用法怎樣，更不能拘泥沾滯，一成不變。字句弄懂了，然後標

出每段的大旨和全篇的主意來，這便是古人所謂「離經辨志」的工夫。必須這樣才算當真讀過一篇文章，讀過一本書。假如模模糊糊隨眼滑過，看到後半，忘了前半，主旨所在，內容所包，一概茫然。縱使讀過萬卷書恐怕依然書是書，我是我。古人稱贊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請大家不要誤會「不求甚解」並不是「不求解」。像漢朝秦延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那叫做甚解，若是模糊影響，當解而不解，就算是「不求解」了。奉勸正在讀書的朋友們不要邯鄲學步冤枉了陶淵明！

光能了解別人寫出來的東西而不能把自己心裏蘊蓄着的情感或意思，清晰明白的用文字發表出來，那還沒有具備現代國民的資格。了解是「知」的工夫，發表是「能」的工夫，「知」和「能」應該並重的。在看書或讀文的時候對於別人事構思的程序，布局的先後，文法的組織，修辭的技巧，當真能夠了解的透澈，耳濡目染，浸潤久了，慢慢地自然而然地就會得心應手培養成自己的發表能力。我

們生在現代，自然無須模擬古人去作那和實際語言不相應的死文字，不過就是用白話來寫文章也不能信口開合隨便胡扯的。無論講話講的多麼好，嘴裏說的和筆下寫的總不能完全一樣，這就是古人所謂「文不逮言，言不逮意」。記得民國二十二年我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講演，趙元任林語堂兩先生在上海聽。後來他們告訴我，原稿上有一個字，我講的時候說了十七個字。可見「話」和「文」的分別並不限於「白話」和「古文」的分別。要把口語寫成文章，至少要經過構思，排列，剪裁，潤色的幾道工夫。我嘗說現在的人作文章常犯不知「鎔裁」的毛病。什麼叫做「鎔裁」呢？這是借用劉勰文心雕龍上的兩句話：他說：「規範本體謂之鎔，翦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再往淺一點來講，就是說一篇文章總得有個主要論點，造句遣詞不能犯浮泛蕪雜的毛病。這幾句話看着容易作起來却難。嚴格的一審核，不用說初學的人十篇有七八篇作不到，就是已經成了名的作家或學者也往往有人愛寫「博士」

書券，三紙無驢」的玩藝兒！所以我對於一般國民的希望，只盼人人能夠把自己的情感或意思，清清楚楚的，有條有理的，不跑野馬，不說廢話，老老實實的表達出來就夠了。至於神而明之，大而化之，超凡出奇，別創風格，那是文學家的事不是一般人的事。

近幾年來，每到暑假都得評閱各大學統一招考的國文試卷。昆明天氣雖然不熱，可是看完卷子總覺得頭昏腦漲，鬱悶難舒！因爲看完一百本卷子不見得挑出一兩本好的來可以安慰安慰自己。就大毛病來講，不是別字連篇，就是文不對題，凌雜浮泛。考驗閱讀能力的標點分段和解釋字義的題目，也是錯誤很多笑話百出。這自然是中學國文教學和大一國文教學上的頂嚴重問題，同時一般國民對於本國文字的修養不夠也是很顯然的。所以今天我特爲提出這個很淺近而頗重要的問題來和大家談談。

至於漢字改革問題已然甚囂塵上鬧了好幾十年。它的經過情形在我所寫的

一本國音字母演變史裏已經說得很詳細。照我的意見，在小學時期未嘗不可仿照從前北平孔德學校的辦法用注音符號或國語羅馬字來代替漢字，以減少兒童識字的困難。從初中以上就得用注音符號輔助讀音逐漸認識漢字，並試着閱讀用漢字印行的書籍。要想完全廢棄漢字單用拼音文字來代替，那似乎爲期還遠的很。至於漢字拉丁化運動，照我個人的意見覺得比推行國語羅馬字更加困難。現在爲時間所限恕不多談，等有機會咱們再來討論。

# 中國文學的新陳代謝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在昆明廣播電台講演

文化的演變，都是慢慢兒地，一點兒一點兒地在那兒變，絕不會抽冷子一下兒從舊的變成新的。可是，改變的泉源既然湧出來以後，不管它潛伏多少年，總有一天會成了很大的潮流，一瀉千里地一個勁兒冲下來，越碰見大石頭擋着它，越可以激盪成很美麗的浪花；要是有意的去堵塞它，就會叫它蓄積成更大的力量，有一天衝破隄防奔放出來，越發的沒法兒收拾！

拿中國文學的改革來說罷，從喊出「文學革命」的口號那時候算起，到現在不過二十幾年。可是，要追溯它的泉源，那麼，漢魏南北朝的樂府，唐宋的語錄，元明的戲曲小說，不都是很好的白話文學嗎？明末公安三袁所提倡的「獨抒

性靈，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不就是胡適之「八不主義」的先聲嗎？梁啟超的文章「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不就是解放文體的前驅嗎？在當時，因為被傳統的舊文學掩蔽着，所以不大有人注意它。認真說起來，「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學形式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胡適逼上梁山）。現在沒工夫一一的舉例來證實它，只能把近二十幾年來新舊文學的消長情形略微談一談。

自從民國六年一月，胡適之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以後，文學革命就開始發動了。他在那篇文章裏提出了八條主張：

- 卷一  
一、須言之有物；
- 二、不摹倣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就是後來文壇上盛傳的「八不主義」。當時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一班人都起來響應他。陳獨秀在六年二月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他的結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  
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於是文學革命的旗子才正式扯起來了。後來經過許多討論爭辯慢慢兒的從消極的破壞走上了積極的建設，到七年四月胡先生又發表了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字的宗旨。簡單說來，他們的中心理論只有兩個：一個是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學」，一個是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後一個理論是文學內容的革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切理論都可以包括在這兩個中心思想的裏頭。

這一個時期新青年社所領導的白話文運動可算是發展到頂點了。不過，新青年是提倡一切革新運動的，白話文運動只是其中的一個項目。到了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的勢力越發突飛猛進的發展着。有人估計，這一年裏頭至少出了四百多種白話報。那年的冬天文學研究會就在北平成立了。商務印書館發

行的小說月報也在這時候改由沈雁冰編輯，完全把內容刷新，成了新文學運動中最重要的一个機關雜誌。到了這時候新文學運動才和一般革新運動分離開，自有它更精深的進展和活躍。

文學研究會的刊物可以拿小說月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作代表。這兩個刊物都是鼓吹着爲人生的藝術，標榜着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他們反抗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抗拿文學做遊戲的鴛鴦蝴蝶派文人，他們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的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革命的旗幟。

和文學研究會立於反對地位的是創造社。創造社在民國九年五月刊行創造季刊，後來又刊行創造週報，並且在上海中華日報附刊「創造日」。他們所樹立的是浪漫主義的旗幟，他們的批評主張純然抱着唯美派的見解；他們「要追求文學的全，要實現文學的美」；他們想拿文學當作「精神生活的糧食」，叫人們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歡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躍」。

新青年從第九卷以後，已轉變成一個急進的政治團體的機關報了。初期參加白話文運動的戰士們也都轉向的轉向，沈默的沈默了。只有魯迅所領導的語絲，莽原，兩個小刊物還照常的鬥爭着；由他組織的未名社也培植出一批新進的分子。以上，我爲說話時的便利，把民國六年以後的新文學運動一貫的敘述下來。可是，它實際進展的情形，並不像這樣順利的。自從文學革命的呼聲喊出來以後，截到現在爲止，前後經過三次很激烈的抗爭：

(一) 安福系的衛道 新青年上所發表的許多關於革新運動的理論，在一班衛道的老先生們看起來，禁不住要大驚失色的。林琴南(紓)便是這班人裏的一個代表。他在民國八年三月間給蔡子民先生寫了一封長信，對於新派攻擊的很厉害。現在只摘錄他反對白話文的一段如下：

天下唯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

爲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

後來他被蔡先生覆信駁得沒話可講，又在上海新申報發表了荆生和妖夢兩篇小說。在荆生那一篇裏拿田其美，金心異，狄莫，影射着陳獨秀，錢玄同，胡適三個人；在妖夢那一篇裏拿元緒，田恆，秦二世，影射着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三個人。內容等於村婦罵街值不得識者一笑！他理想中的荆生，便是他倚爲「府主」的安福系首領徐樹錚——他的言論應該是有背景的。

(二) 學衡派的崇文 胡適之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因爲發動文學革命的理論就和他的幾個同學打了一場很熱鬧的筆墨官司。這一部分人回國以後，民國十一年在南京發刊一種學衡雜誌，仍舊反對白話文。它的弁言第三條是「籀繹之作必趨雅

音以崇文」，末尾又說：「莊生有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同人不敏，求知不敢懈。第祝斯志之出，不聾盲吾國人，則幸矣。」現在且引其中的一段話以見他們反對新文學的態度：

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併爲一談？吾

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的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爲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彼之謂。若古文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云，則古文之後，當無駢體，白話之後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文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爲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乎？（評提倡新文化者）

從這種議論固然可以看出他們對於舊文學癖好很深，可是它絕對擋不住文學革命的奔流的！

(三) 甲寅派的掙扎 安福系和學衡派的辯爭不單阻遏不住文學革命的奔流，因為互相激盪的結果，反倒使新文學更加活躍了。可是到了民國十四年甲寅雜誌又有一度的迴光返照。它的主筆章士釗說：

白白話文體盛行而後，髦士以俚語爲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文事之鄙陋乾枯，迥出尋常擬議之外。黃茅白葦，一往無餘，誨盜誨淫，無所不至。此誠國命之大創，而學術之深憂，士釗所爲風雨滂徨，求通其志，瓦數年而不得一當者也！（立編譯館呈文）。

又說：

……今人之言，即在古人之言之中。善爲今人之言者，即其善爲古人之言而擴充變化者也。適之日寢饋於古人之言，故其所爲今人之言，文言可也，白話亦可，大抵俱有理致條段。今爲適之之學者，乃反乎是。以爲今人之言，有其獨立自存之領域，而所謂領域，又以適之爲大帝，績溪爲上京，

遂乃一味於胡氏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鶩，筆不輒停，以致釀成今日的底他牠嗎呢吧咧之文變。（評新文化運動）。

自從他發表這種言論以後，唐鋮，高一涵，郁達夫，吳稚暉，魯迅等都有駁斥他的文章。不久，這種反動的餘燼便隨着安福系的政治勢力煙消火滅了。

這三次抗爭只不過給文學革命的潮流激起了幾堆浪花，對於那奔騰澎湃，沛然莫禦的巨流是遏止不住的。從此以後，新文學運動已然到了建設時期，創作時期。在新派本身雖然還有寫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分歧，大眾文學和民族文學的論爭，可是，新舊兩派關於文言白話的工具問題，已然沒有人再提起了。

我今天爲什麼舊事重提來講這一段往事呢？因爲從文學史上看，新舊兩派總是互相消長的，新的稍微消沈一點兒，舊的就會在那兒暗中蠕動。它會借着政治勢力，利用人類惰性，讓人們不知不覺的走向復古的路！我們現在對於中國舊文學，並不是不去研究它，只是應該用歷史的眼光去研究它；並不是不該欣賞它，

只是不要故意的摹擬它。現在大學中國文學系的課程何嘗忽略了各時代的代表作品？何嘗把古書束置高閣？許多有名學者的著作何嘗不超越前人？我敢說，自從文學革命發動以來，在文字工具上固然改良了，可是對於古書了解的精切，對於文學欣賞的深入，這些「釀成今日的底他牠嗎呢吧咧之文變」的人們，比起那些「日寢饋於古人之言」的「文學正宗與專門名家」來，實在「有過之無不及」。只是我們不再鼓勵後進去摹擬「沈思翰藻」或講究「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罷了。

至於一般大學生對於國文了解的程度和發表的能力，照理說，如果中等教育辦的好，應該都在水平線以上的。這時候在選材一方面，除去讓他們對於中國文學更有進一步的欣賞和了解以外，對於近二十年來的現代文學作品也不可以一筆抹煞，定出「生存不錄」的限制。有人說，既然做了大學生還看不懂白話文嗎？如果他喜歡新文藝，自己盡可以在課外去瀏覽，何必佔授課的時間？況且這二十年來新文藝的產量雖多，實質一方面却是瑕瑜互見，未必都是成熟的作品，作者既

然大部分都活着，那麼選擇去取之間，豈不很費躊躇？其實，照我看起來，白話文學並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容易懂。就因為它是新興的文體，所以對於它的設計，結構，文字的運用，人物的刻畫等等，越發得詳詳細細的分析，解釋。你必得講過一回新文藝，你才知道它不容易講；你必得作過一篇新文藝，你才知道它不容易作！又因為它瑕瑜互見，不完全是成熟的作品，所以在選擇去取之間，格外得慎重，才不至於叫後進漫無準則。我們西南聯合大學所用的大一國文讀本經過三次改編，最後的一本包含十五篇文言文，十一篇語體文，四十四首詩，一篇附錄。這不過是一種試驗，當然有許多自覺或不自覺的缺陷。可是，當初選錄的時候，很小心的挑選這十幾篇語體文，無非想培養一點新文學運動裏秀出的嫩芽，讓它慢慢兒地欣欣向榮，不至於因為缺乏灌溉就蔫萎下去。沒想到最近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國文讀本編訂委員會只選了五十篇文言文，四首詩，其中固然經史子集色色俱備，可是把語體文刪的連影兒都沒有了！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這

正是新舊文學消長的樞機！去年秋天有一位大學校長寫信給我，他認為國語文學的運動和建國大業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想請一位有名的作家去領導那個學校裏受好文藝的學生。他在一個陳腐的圈子裏都不顧一切的注意到這一點，難道教育當局倒要反其道而行？難道曾經想「打倒國語運動的攔路虎」的小將和曾經參加過新文學運動的作家反倒妥協了？我從「責備賢者」的觀點看，對於我的朋友們不能不稍有遺憾！至於那些有意走向復古的人們倒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

「改變的泉源既然湧出來以後，不管它潛伏多少年，總有一天會成了很大的潮流，一瀉千里的一個勁兒沖下來，越碰見大石頭擋着它，越可以激盪成很美麗的浪花；要是有意的堵塞它，就會叫它蓄積成更大的力量，有一天衝破隄防奔放出來，越發的沒法兒收拾！」

鑒往察來，我很自信的還拿我的起語當作結語。

## 師範學院國文學系所應注意的幾件事

照教育部所訂現行學制，在大學文學院的中國文學系以外，師範學院另設有國文學系。從部定的兩系課程表來看，中文系修業的期限是四年，所習的科目低年級注重基本訓練，高年級偏重專門研究；國文系修業的期限是五年，低年級教育科目較多，高年級特設國文教材教法研究和國文教學實習兩課。這在只有文學院的大學或獨立師範學院，本來界劃分明，旨趣各別，不會發生什麼疑問的。可是，這五年來，據我兼管兩系的經驗，不單在學生方面總想混選兩系的課程，就是在同人方面也往往有人懷疑為什麼國文系教授不能兼教中文系的科目。為減除學生選課時候的麻煩，並解釋同人的誤會，我想對於國文學系應該注意的各點略說幾句話。

就兩系設立的旨趣言，中文系偏重養成中國文學的專門人材，以從事窄而深

的研究；它所注意的問題，是怎樣繼承中國文學已往的遺產，並開創未來的新文學？怎樣增進了解或欣賞新舊文學的能力，並陶鎔創作的技巧？國文系偏重培植中等學校的國文師資，以改善國文科的教學；它所注意的問題，是怎樣訓練講解清晰，批改精細的國文教員？怎樣提高中等學校的國文程度，並增益一般國民讀書作文的修養？由此看來，儘管同在一個大學裏頭，儘管科目的名稱相同，兩系的教學方針和教材內容，應該各具特色的。

照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國文系所以異於中文系的有左列四點：

第一、訓練須「知」「能」並重：

近年來一般治中國學問的風氣，往往有人涉覽很博，記問很多，只是表現的工具不大夠用，偶爾動筆著作，縱然繁徵博引，却常常詞不達意，精詣累於拙文。這種偏疎的毛病有識的人早就想設法來矯正它。我曾看見一篇講鑒別銅器真僞的文章，它的材料是很有價值的，所提出的方法也是很有經驗的，然而文章的

糟糕真不像個略有虛名的學人所寫的。像這一類的情形頗讓我惋惜。因此我二十年來雖然沒教過普通國文或各體文習作一類的科目，但遇到跟我作論文或作研究的學生，往往朱墨雜施地盡量批改。民國二十三年到北大教書後，所得到的第一個高材生是周祖謨——他現在已經成了輔仁大學的好教師了——他的論文是有價值的，可是它的初稿曾經我大改特改過。我還記得他看到朱筆改稿後很受感動，他認為這是在大學四年裏從來沒經過的訓練。此外凡是跟我作過論文的都應該知道，這裏且不一一列舉。這不過就着中文系的學生來說。假如他不去教書，即使文章作不好，充其量也不過在著作裏增加一些瑕疵，縱或自誤，尚不至於誤人。但在國文系的學生就不然了。他們本來以訓練中學生的國文工具為職責的，「知」的不真切固然難望講解清晰，「能」的不到家改文時更容易發生錯誤。我並不希望他們「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我也不希望他們媲美魯迅，追步茅盾；我只希望他們無論作文言白話，最低限度得要明暢通達，用一字造一句都

得澈底懂得它的意義和功用，每段每章都得有清楚明白的意旨。萬不可不辨平仄而高談賈島盧仝，別字連篇而爭論「八家」「選學」。曾經看見一本文卷把「徙倚中庭」改作「徙倚小窗」；又有一本在「屏諸四夷」的「諸」字底下加了一個「於」字：一見改筆便可知道這兩位先生不懂得「徙倚」和「諸」的真正意義！這和「文章雖好尙欠美中不足」的批語可算是異曲同工了。像這種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現象如何能怪中學國文程度一落千丈呢！要想挽救這種流弊，必須嚴格訓練國文系的學生知能並重，應該增加各體文習作的次數，並且先讓他們自己互相批改，然後再由先生範改。

第二、讀書須「博」先於「精」：

凡是大有成就的學者都是「精」「博」「通」並重的。但近年來學術界的狀況，往往專家多而通材少。通材的末流固然可以由通而淺，由淺而俗；專家的下乘也往往因專而僻，因僻而陋。國文系學生雖然未見得人人可作通材，但切不可

在常識還沒有廣博的基礎以前先硬鑽牛犄角尖兒，走上了專門的途徑。這樣一來，縱使能造成所謂專家，却絕不適於作中學的國文師資。因為中學國文教師必須博而不陋，然後纔可以有問斯答，因勢利導。所以國文系學生讀書的步驟，應該先務博，而後求精。對於學術源流，文章派別都應該有深切的認識；對於眼前的新舊要籍，都應該有相當的了解。必須極力矯正浮光掠影，以耳代目的毛病，然後纔不至於孤陋寡聞，自欺欺人。

### 第三、應該提倡中學國文教材教法研究：

從前有一位朋友批評國文教學法說：「我不懂得什麼叫國文教學法，我只知道自己通了，就可以讓學生通，自己寫得好，就可以使學生好！」他後來雖然在一個大學裏把師範學院的國文系辦得有聲有色，可是這幾句話還是不足爲訓。因為近來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是無可諱言的。推究它的癥結所在，一方面由於教材的不適宜，一方面由於教法的欠斟酌。坊間流行的國文選本多半按照文學史的

順序從周易的乾文言一直選到魏際瑞的雜說，不管學生能否接受，只求應有盡有。有些文章在大學講起來還嫌深，硬逼着初中或高中的孩子囫圇吞棗嚥下去，試問他如何能咀嚼消化？近來看到一本初中的國文選目把當代偉人的政論或演說盡量地羅列進去，假如不看封面的標題，我幾乎把它當做黨義或公民的綱要。這似乎忘了國文科的教學目的是在養成學生閱讀寫作的能力了！這個問題本來不簡單，不是一兩個專家在書桌上懸想設計，或幾位官員在辦公室裏擬稿畫行，就可以解決的。必須請幾位對於中學國文教學有經驗有興趣有研究的人，領導國文系的學生把舊選的教材作一番檢討，把擬選的教材作多次的實驗，然後共同商定一部由淺入深，適合各級學生程度，足以增進閱讀寫作能力的讀本。這也不是一個師範學院的國文系所能獨自擔承的，必須各校共同商定計畫，羣策羣力，分工合作，纔能得到滿意的結果。至於教法一方面也有過猶不及的兩種毛病。負責太過的一每講一篇文章把他所知道的恨不得一下灌注給學生。譬如講一篇孟子許行章，

先從孟軻傳略孟子解題孟子的文章和辯證法講起；然後講到許行陳良陳相一班人的學說，也許一跑野馬就牽到共產主義或民生主義；本文字句的解釋倒成次要了。這樣的教師也許說得天花亂墜，讓學生瞠目咋舌，莫明其妙，按其實際却鬧得「三紙無驢」，「座大於像」，既然耽誤了教學進度，也不見得使學生受到實益。這種毛病在剛畢業的學生——尤其是沒受過師範教育的中國文學系的學生——很容易犯，在它的反面便是那些敷衍塞責的教師。他們懶惰性成，存心鬼混，不認識的字不肯查，所以把「枘鑿」念成「柄鑿」，把「作俑」念成「作誦」；不懂得的典不肯問，所以把程顥升入唐朝，把孔雀東南飛列入文選。上課信口開合，下課任意荒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但求餌啜有資，何恤誤人子弟！照這樣情形，難怪化學系學生也可以濫竽國文教席了。要免除這兩種毛病，得要從師範學院國文系的學生嚴格訓練起。在教法研究班上應該時常討論練習，在教學實習的時候從登講壇到下課都得動由規矩地合乎法度。作文時從命題到批改，

也得遷就學生，點鐵成金。自己心目中的問題不見得適合學生的思想，「濃密密點，狼藉行間」或「一筆抹煞，另灶的爐」改文法，未必能改善學生的作文技巧；這也得經過精細研究，長期訓練，纔能應付裕如的。總之，教書的對象是「人」不是「我」，應循序漸進，因人施教；不可矜奇炫博，賣弄學問。河北高闐仙先生步瀛在北平師範大學教國文時，把每篇文章注釋的非常詳細。這在好高鶯遠的人看來，也許覺得這種「卑之勿甚高論」的講疏談不上學問，可是，拿起來教書，那真可以奉為枕中鴻祕了。所以我希望國文系的學生發憤作兩件事：第一、在教授領導指示之下分頭箋註擬選的教材，作為集團預備功課；第二、統計歷年大學新生入學國文試卷和中學國文課卷裏的錯誤，仿照夏丏尊文病院和朱自清文病類例的辦法加以整理，作為將來對症下藥的方案。這兩件事在西南聯大師範學院已由彭仲鐸張清常余冠英李廣田諸君督促進行了。

第四、應該推行國語國音的教育：

國語運動胚胎在三百年以前，推行近三十年之久。關於標準音的採擇和注音符號的製定，早已約定俗成，從商討時期，進入實行時期了。師範教育和國語運動關係的密切，我已經在另外一次講演裏解說過，這裏且不多談。不過至少咱們得知道：國語和國音是全中華民族共同抒情達意的工具，國語教育推行的得法對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上有莫大的幫助。國文系的學生是負有推行語文教育的使命的，如果他們所說的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官話，那如何能希望國語國音輾轉擴充呢？再說，政府近來對於西北和西南各省的邊政是很關心的，要想融和邊疆各宗族，增加全民族的團結力，尤其非積極推行國語教育不可。照教育部所定國文學系的課程列有語言學一科，下面特別注明「注重國語及國音」。我認為語言學的內涵絕對和國語國音不同，國文系的學生不一定必修語言學，但一定得要必修國語國音。所以我主張在部定國文學系必修科目表裏刪去語言學，而代以「國語國音」及「國語運動史」兩科。另外添設短期國語訓練班

以供師範學院其他各系和初級部各組學生的選習。這種課外活動，西南聯大的國文系學生曾經推進過，我特為他們聘請導師指示，並預備了一套趙元任先生灌製的國語留聲機片讓他們時常聽。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兩級學生有幾個華僑或粵籍的，到畢業時，他們已經可以講很流利的國語了。自抗戰以來，國語教育的推行略有沉寂的現象；並且聽說在某處一個小學教員因為傳習注音符號惹惱了當道要人，一紙八行便累得他所屬的那個小學校長丟官罷職。自然，戰時應該做的事太多，但國語教育至少不當列在不該做的裏頭，這點理由我在「融和宗族與推行語政」一文裏已經發揮過了（參看本年十一月七日正義報星期論文）。要想認真樹立國語教育的根基，首先必得從國文系的學生嚴格訓練起。

以上四點看起來似乎很平常，然而這就是師範學院國文學系所以異於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的地方。兩系儘管同在一個大學裏，也必須依照不同的方針，分別徵不同的教學。學生除非決心轉系，總得認清目標，按部就班，安分守己地受國文

學系特有的訓練；教授所授的課程儘管和中文系的科名相同，也得準據國文系的教學宗旨，特定教材與教法。除非萬分不得已，兩系必須各自具有獨立風範的。

——當代評論第四卷第二期

## 我的中學國文教學經驗

截到現在爲止，我一共教過四次中學的國文：

第一次是民國十年春天到夏天，在北平市立第一中學校；

第二次是民國十年秋天到十一年夏天，在天津私立南開中學校；

第三次是民國十一年秋天到十二年夏天回到一中；

第四次是民國十四年秋天到十五年夏天在北平私立四存中學校。

這四次中間只有在南開的一年算是專業，其餘兩次多少都帶點「玩票」(*passenger*)的性質，因爲那時候我在教書以外還有別的職業。

民國八年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後，人剛滿二十歲，受當時新文化潮流的激盪，又沒有力量到國外去留學，便決定再入哲學系念書。那時候北大哲學

系最熱鬧，教授中如胡適之、梁漱溟、蔣夢麟、陶孟和、陳百年、傅佩青諸位先生而外，還有從國外請來的杜威（John Dewey）羅素（Bertrand Russell）兩位先生。同學中像顧頡剛、朱自清、田培林、吳康、譚平山、朱謙之、章廷謙、李榮第、宗錫鈞、陳政、蔣復聰、王焜崑（汝璵）、金公亮等，乃至於陳逆公博，都是這幾年裏先後造就出來的。我念到第二年下學期的時候，中學的同班董魯安（璠）約我到一中兼教五小時國文，一小時修身。魯安是北平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出身，他是第一個提倡在北平市立中學的國文課程裏兼教語體文的，在當地北平的中學界算是一個風頭十足的國文教員。他因為高師附中的功課忙不過來，所以約我到一中去接他的手。我很記得，第一次聽見上課鈴，心裏真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忐忑不安！校長致完了介紹詞以後，我還沒有像一位好朋友那樣：在黑板上連續不斷寫「請等五分鐘」，「再等五分鐘」……挨到半點鐘後，終於一語不發的下了堂。我總算開腔了，而且信口開合的繼續說滿了一點鐘，不

過事後聽一個相熟的學生說，當時的聲浪確乎有點兒顫抖。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希奇，照聲學（acoustics）的原理講，一切聲音的構成都由於彈性物體的顫動，我當時不過顫動率比較大一點罷了！在這短期內教過的學生，後來有所成就的，有潘鳧公（式）和齊燕銘（振勛）兩個。後來從天津回來，再到一中，因為兼管事務，對於教書的經驗反倒記不清楚了。

第二次到南開去教書就比較老練多了。記得我剛到二年級的一組去上課，在課室門外聽見一個很淘氣的孩子（後來知道他叫夏芝）在那兒喊：「看！新教員是個小孩兒！」我跑到講台上，借着這個碴兒先發了一頓下馬威說：「你們看我像個小孩兒嗎？你們知道不知道古人有『三歲爲翁，百歲爲童』一句話？假如我這個孩子可以作你們的老師，那麼我便有作『翁』的資格，<sup>假</sup>你們就得安安頓頓作『童』；假如我不配作你們的老師，那麼我想充『翁』也不行，縱然我家裏沒存着一石糧，我也沒臉再作『小孩王』了！咱們姑且以一禮拜爲期，如果我不稱職，

到時候我自然會捲舖蓋。」說完這一段話大家居然靜悄悄地連一口大氣都不再出，老老實實聽講。從此以後，不單相安無事，而且師生間的感情十分融洽。那一班的學生裏有一個國文很通順，而且會作兩句舊詩的，叫吳靖威；有一個天真爛漫的廣東孩子，後來在童子軍界頗有聲名的，叫徐觀餘。還有一個當時南開體育界的「大金剛」張穎初，他是陝西人，身材很高大，心地很樸誠，國文程度很好，文言語體都作得像樣子，年齡大約比我大，但是在老師面前總是規規矩矩的溫和恭順。直到民國十三年我在西北大學教書的時候，無意中在西安街頭碰見他，那時候他正參加渭北靖國軍的祕密工作，見面後還是很謙遜懇摯的，他後來改名張鋒伯，追隨馮煥章先生多年。另外還有四年級的一組，學生是預備入商科的。其中有一位叫寧恩承，他進南開中學以後，曾經因為發表一篇「循環教育」出了名，後來從外國留學回來，在財政界頗有地位，中間作過一度東北大學的祕書長。北方人畢竟樸誠，直到他貴顯以後，他通訊時還以「受業」自稱，比那一班

過河拆橋的漢人，因為地位增高，慢慢把「夫子」降為「仁兄」的，懂禮多了。

此外不在這兩組上課的，還有許多人常在課外找我談談。其中讓我懷念很深的，就是民國十四五年間在文藝界有小聲名的張采真，那時候他叫張士濬，是河北霸縣人，性情溫柔而富於文學興趣。後來因為黨爭在漢口殉難。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他在北新書局出版的集子「如願」，恐怕和「采真」這個名字一同被人忘記了！

最後一次在四存學會創辦的，學風很篤實，却不免保守。校長齊樹楷，持躬對人都有可學的四存學會創辦的，學風很篤實，却不免保守。校長齊樹楷，持躬對人都有可取的地方。有一天一個坐汽車的學生家長要拜訪校長，看見一個穿着破舊布衫在校門口掃地的老頭兒，就喊他通報一聲，交談之下才知道眼前失敬的正是他要拜訪的人。<sup>十二</sup>這時期我因為旁的事很忙，不能專心致志的教書，當時的印象漸漸的模糊了，只記得講讀和作文而外還教一小時文學史，講讀的課本，學校指定用王琨繩的左傳評。